

民國時期天主教高等教育觀

Ruth Hayhoe 著 林瑞琪譯

本文專注於介紹馬相伯和英斂之兩位傑出的天主教思想家，探討他們於清末民初中國踏向現代化政治體制過渡期間，在政治及經濟的亂世中，對中國教育的貢獻。馬相伯及英斂之兩位先生均一致認為，現代化的大學是急遽轉變的社會中重要的催化劑。他們之所以有同樣的觀點，不但因為他們兩者均熱愛中國傳統文化，更因為他們二人都懷有強烈的基督信仰。

馬相伯出生於始自十七世紀的公教世家。一八五二年上海耶穌會徐匯公學創校時，他是最早期的學生之一。在法籍耶穌會士的影響下，他接受了傳統的歐陸式教育。當時在他們的學制上，常視「神學為眾學之冠」，而其他學科則包括古典拉丁文、希臘文、哲學、數學、天文學、藝術及文學。（註一）一八七零年馬相伯加入了耶穌會，在會內擔任過多項不同的職務，並曾一度擔任徐匯公學校長。可是，在一八七六年，馬相伯一併離開了耶穌會及天主教會，成為李鴻章的幕僚，參與洋務革新運動。經過二十二年世俗事工之後，馬相伯又於一八九八年重投宗教生活。雖然他在得到教會及耶穌會的接納，但並沒有重拾司鐸職，而是用了一段日子（一說是整個懺悔年），在徐匯公學渡隱修生活。（註二）這時候，他重新翻譯了新約的中文版。（註三）

與馬相伯不同，英斂之並非來自公教家庭。他原是滿州人，幼年僅讀過一點古籍。倒是在青年時期，他立志潛修哲學，飽閱儒、釋、回、道各家的經籍及文學著作。同時，他也開始接觸到基督宗教的著作，包括天主教及基督教的都有。他在北京遇上了仁愛會修女，結果於一八九五年受洗成為天主教徒，時年二十五歲。英斂之的天主教信仰，加深了他本身的社會責任感，一九零二年他在天津所創的《大公報》，是最佳的證明。他一再在報上表達爭取民主、公眾利益及語言改革的決心。儘管英斂之一如他的前驅戰友馬相伯，是一個革新者而不是革命者，但他的報紙仍對積弱日深、走上末途的滿清政府的內政外交，加以深切的評論。辛亥革命以後，英斂之出售了大公報，改為全力興辦教育。他認為這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關鍵所在。一九一二年，英斂之與馬相伯聯名呈請教宗庇護十世，准予在北京成立一所天主教大學。（註四）

保羅高漢（Paul Cohen）在研究沿海及內陸傳教士的事蹟時，曾下過評論，說奔波於中國沿海城市如上海、香港等地的中國基督徒社會改革者的行為大都十分個人化，很少在文字紀錄上留下信仰的痕跡，因此很難從出版物當中，看出他們的信仰心火對中國社會改革運動有甚麼影響。（註五）但這種

論斷對馬、英二人完全用不上。雖然馬相伯在十九世紀時出版的著述不多，但在二十世紀的首四十年中，他的大量著作明顯地流露出強烈的公教信仰意識。在參與社會及文化活動時，他絕不諱言天主教信仰是整合他的社會思想的力量。英斂之的情況也大致相同。也許他的工作可能沒有那麼學術性，但他的信仰不但表達在日常生活上，也不時在大公報的社論中流露出來。辛亥革命在一夜之間成功，帶來了新希望也造成新的混亂。他們兩人都深信，新成立的共和國能否締造新社會的前途，全繫於中國教育體制上的改革。兩人同時向天主教團體呼籲，聚合各方力量興辦高等教育，以求實現民主共和，並促使中國文化進入新的紀元。

馬、英二人向教宗呈請開辦天主教大學時，他們提到在耶穌會來華初期，利瑪竇、艾儒略、湯若望及南懷仁等教士在傳統上都甚有學養。早期教士在宣講基督宗教訓導之餘，也帶來了最先進的天文及水利知識。他們說可惜這一傳統在近代沉寂了下來。很少傳教士會視學養為他們基督徒職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因此之故，絕大部份教友都是來自社會低層，很少飽學之士會廁身其中。因而，在清代改革派曾欲尋求天主教協助革新教育體制時，他們結果要改為找基督教幫忙。（註六）基督教傳教士常傾全力興辦高等教育，但天主教傳教士卻好像無意效法早期耶穌會士的步伐。中國既致力於建立共和政體，培育深受教育的社會公民以領導政治鬥爭，是至為重要的事。他們明白到有急切需要成立一所天主教大學，以收納教會內外的學生，好使「教會內者能把他們的學問用之於社會，」而「教會外者又能在尋求學問時找到人生的真光。」（註七）



馬相伯

震旦、復旦兩校的成立

一八九八年維新運動失敗，是馬相伯一生的轉捩點。他原計劃請求清廷資助，希望在上海成立翻譯學校，但未能成功，於是他離開了政界，重返天主教信仰中尋求生活的真諦。在這個時候他感覺到參與社會改革事務，必須有更深刻的內心基礎。他在徐家匯靜修及反省的時候，有一天，新成立的南洋公學一位年青講師蔡元培來探望他，邀請他任教拉丁文。這次會面引發起他們成立一個學習小組，包羅了來自全國不同地方的年青人。馬相伯因而擴大了教學範圍，不但包括拉丁，更兼及哲學、數學及法語。（註八）從這個核心小組開始，馬相伯有意成立「一所跟得上現代西方大學步伐的新式中國大學。」（註九）既然有了一班傑出的學生，也有他自己家族豐厚的產業作支持，馬相伯於是希望把新的大學建立在公教信仰基礎上。因此之故，馬相伯把個人所有產業全獻給了

耶穌會，作為新大學創校之用。（註十）

雖然馬相伯十分欣賞早期耶穌會士的學養及他們對中國社會的貢獻，但他所作的這一決定後來卻使他終身遺憾。震旦學院成立後兩年，馬相伯就與法籍耶穌會士在徐學匯耶穌會天文台臨時館址內，發生了無法彌補的衝突。馬相伯深信大學最重視的應是現代科學，與中國文化及西方文化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且不應受任何宗教爭議所影響。（註十一）他所安排的教程反映了他的想法。學生先打好古文及拉丁文的基礎，然後轉攻現代中國及西方文學，再及哲學、數學及自然科學。馬相伯在校務行政上亦有劃時代的創舉，他與學生一同嘗試自治，賦予他們在權力架構中有代表席位。（註十二）大學的教學並不規囿於形式，而是強調自我學習。學系教職員自行選訂教材，並鼓勵學生以評論及分析能力來寫論文。講學授課盡量減少。這種學制在很多方面與中國傳統書院有相類的地方。

不過，法籍耶穌會士對現代大學的體制，有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們趁著馬相伯在一九零五年病重的機會「製造一連串事端」。（註十三）他們取締了學生委員會，代之以由一位耶穌會士擔任教務長的統制架構。（註十四）他們開始引進法式教育，中止學習英語，也貶抑了中文地位。他們也拒絕庇護那些反清志士，（其中最著名的是于右任，他以假名報考入震旦，以避清廷的迫害。）並公然宣佈他們要招收一些謙順服從的學生。這次「學潮」的結果是，馬相伯與他的學生一同出走，在一九零五年成立了與原校抗衡的復旦公學。（註十五）諷刺的是，這兩所學府都未能達成馬相伯原來建立中國天主教大學的願望。震旦成了天主教大學

，但體制上卻是法國化多於中國化；而復旦雖然是中國式的學府，但內容方面並不是以天主教為主。（註十六）

震旦學院在後來成為了大學，它的高度學術水平，在一九零五至一九四九年間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是毫無疑問的。大部份課程以法語教學，對授教及實驗工作均特別重視。它的學生受到全面的專業培訓，很多都在機械、法律及醫療方面有傑出的表現。當然，震旦的課程也包括文學及科學，但畢竟著重的是法國的傳統教育，以培訓專業人員為主，而不是馬相伯原來所倡導的「中西學問兼收並蓄」。震旦畢業生後來在國民政府多個專業部門大受重視。不過，日後國民政府的積弱及至最後的敗亡，說明了為中國社會而言，一面倒的西化所能發揮的作用實在有限。（註十七）不過，以後多年間，馬相伯仍擔任震旦的校董，耶穌會也按月給他支付薪酬，以答謝他對震旦的捐資。一九三零年代曾有人有倡議遷校往東南亞，但馬相伯堅持震旦應留在中國國土內。他的看法得到校方的尊重，這也反映出何以多年來震旦仍可以稱為「他的大學」（註十八）。

復旦大學方面，直至一九三零年代為止，都與馬相伯緊密聯繫。馬相伯捐出了部份入息，以支持學校的經費。復旦逐漸以強烈的愛國思想而馳名。但是，在新穎的課程及激烈的革新之餘，復旦也日漸偏離天主教思想，且學術水平也開始下落。為他們來說，採取實際行動以滿全社會的需要，較諸建立學風及傳統更加重要。誠然，馬相伯對復旦的愛國精神十分滿意，但其中的世俗及功利主義傾向卻難免令他有點失望。馬相伯認為，復旦大學錯過了更深入地揉合中西文化，促使中國傳統文化邁向更新境界的機會。



英斂之

輔仁社與中國學府的構思

與其等待教宗答覆他們的請求，英斂之乾脆於一九一一年，在復甦中的北京市，成立一個天主教學術團體。他從各省招收了四十名年青天主教學生。這個團體的性質，與馬相伯於震旦成立前在上海所成立的團體相類。唯一分別是前者具有毫不含糊的天主教特色。（註十九）英斂之的想法是讓年青學子對早期中國基督宗教學者有更深厚的認識，從而啟迪他們效法這些在十六、十七世紀有顯赫成就的中國天主教學者的芳表。他們的學習方法仍是保持非正式的「書院」形式，每位學生選定自己的主題，從事個人的研究。無疑，英斂之十分重視早期耶穌會傳教士的學術工作，但他亦絕對沒有忽略早期中國基督宗教所撒下的種子，例如研究景教及

元代方濟各會士的著作等。

對元代基督宗教，即人們所稱的「也里可溫教」的研究，吸引了一位年青新銳的歷史學者陳垣的注意。他對宗教史甚感興趣，所以能在英斂之的書室中找到大量早期中國基督宗教文憲。一九一八年，東風雜誌連載了陳垣有關元代基督宗教的文章，得到馬相伯贈序及英斂之撰跋。這奠定了陳氏以社會歷史學家作為終身職志的基礎。（註二十）雖然陳氏畢生未有受洗加入天主教，卻切誠與英斂之及馬相伯二人共事，使他與輔仁社及後來的輔仁大學，結下終身不解之緣。

隨後多年，馬相伯在中國政界又重新活躍起來。一九二三年他擔任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首長，並曾於袁世凱當政時代出任高級顧問。袁世凱任總統時期，馬相伯是制憲委員會的成員之一。馬相伯一直以來的政治目標之一，就是建設立憲政府，以及如何在中國成立共和政體。可惜，他對袁世凱的行動感到失望，亦無法阻止袁復闢稱帝，因此於一九一七年掛冠返回上海。

馬相伯未返上海之前，曾展開一項也許是他畢生最偉大事業的構思，與章太炎、梁啟超兩位先生合作，興辦「漢夏古文院」。雖然他們三人在政治立場上有明顯的分野，每人的背景也各有不同，但他們都同時深切地意識到，有需要盡早成立一所不受政府干預的獨立學術機構，以維持國民對現代中文的修養。馬相伯早年一直是仰慕法蘭吉斯學院的體制，並經常希望能在中國應用同樣的模式。（註二十一）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搜集及整理中國古典文學材料，以供日後作科學化的分析。這所學院也將肩負語文改革的重任，建立合邏輯的分類系統及統一的詞彙，以重新整理中國古典文獻。這所學院

也負責把外國文獻及科學塑材翻譯成為中文。

章太炎及梁啟超委託馬相伯起草計劃大綱，也就是他於一九一三年在「東風雜誌」所刊載的文章「漢夏古文演義」。馬相伯建議學院應分成不同的單位，包括七個研究中心，分別研習哲學、數學、物理、藝術、建築、動物學及植物學，另設五個部門，專責釐定古文詞匯、保存古物、出版古籍、中文改革及評審學術資格。馬、章、梁三人分別延攬了十九位學者加入這學院，構成了學院的基本陣容。他們也製訂了收錄新成員的程序，並定總名額以四十人為限。財政支出應由省政府承擔，馬相伯且呼籲當地人士效法從前人們資助「書院」的例子，對這所學院多加贈予。（註二十二）

馬相伯所精心策劃的大計，連局部也未有實現。袁世凱並不熱衷於成立這樣的學院，尤其是他們要求政府大量的資助。倒是後來蔡元培實現了馬相伯的一些構思，在一九二八年成立了中央研究院。

馬氏致力建立學院，反映了他個人的深厚學養，亦顯示出他把現代天主教學術思想與俗世學問一同融匯在當日中國的高度能力。他的努力，促成了以科學方法重新整理中國古典文化，也促進發展語文研究機關，使中文能隨著現代中國社會而演進。馬相伯也為中國哲學與天主教哲學的結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就如聖多瑪斯結合了公教思想與古典西方思想，為現代西方文明的發展立下根基。馬相伯深信文化演進不可缺少精神領域上的成熟，因此視宗教為人類探索人生意義的重要一環。（註二十三）他對中國天主教大學的寄望，不同於西方傳教士斤斤計較傳教及教義方面的得失，而是藉著天主教會，把中國及西方文化融合起來。

輔仁大學既屬天主教又具中國特色

一九一六年馬相伯印行一份簡章，講述建立新的天主教大學的宗旨。文中馬相伯表示滿意教廷委託美國本篤會統籌創校工作。

（註二十四）他相信本篤會十分適合這項任務，因為他們不但具有崇高的歐洲傳統文化修養，並且對現代美國科技有具體的認識。他深信本篤會不會在中國的土地上建立西方文化封邑，而是與中國一同努力，使新成立的大學成為中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註二十五）

更重要的是，馬相伯覺得本篤會能夠欣賞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並與中國基督徒一同努力使中國社會現代化。他希望能避免墜入西方工業化的陷阱，以免傳統道德及精神價值受到腐蝕。在他看來，新大學的課程應以神學及哲學為基石，兼及文化與科學，好能推廣應用科學。由於中西文化並重，所以能在真正的中西文化對話中探索社會工業化的演變歷程。

事實上，輔仁大學的大部份課程，都是參照馬相伯的意見，只有兩點例外，就是沒有開設神學及機械工程課程。為了方便創校，英斂之恢復了輔仁社，並親自執教中國文學、哲學、歷史、數學及英語。創校時的二十三位學生，全是天主教徒。到一九二七年輔仁大學正式成立時，學生人數已增至一百五十人。以後幾年，輔仁大學不斷擴展成為一所在藝術及科學方面都十分突出的綜合大學。至一九五一年為止，校友人數幾近六千之譜。（註二十六）

輔仁大學的課程，的確有利於實現馬相伯匯聚中、西文化的願望，為中國現代化立

下穩固的文化及精神基礎。但是當中成功的程度，仍有待人們再作深入的研究。不過，輔仁大學的確能透過自由研究小組，培育活躍的研究氣氛及議論的精神。他們經常邀請校內專業人士來校講學，又與北京其他大學保持緊密的合作。此外，他們亦出版多種不同的大學刊物。陳垣所主編的「輔仁學誌」，每半年出版一次，收錄在歷史、語言學、文學、宗教、哲學及藝術各方面，作不同文化比較的論文。此外，「輔仁叢書」當中，亦收羅了不少陳垣史學著作的單行本。其他刊物包括專為海外華僑而設的「華裔學志」，以英、法、德多國文字發行。另有研究人類學的「民族雜誌」。非定期性的出版物如「輔仁生活月刊」，是由教職員與學生所合編，專為促進校園內的知識及文化氣息。「輔仁文苑」，則是一九二七年輔仁大學學生與燕京大學同學合辦的文學學報，他們幾經艱苦仍堅持出版，直至一九四一年為止。當時，其他文學學刊也早被日本侵略者封報。（註二十七）

創校者原先希望學生自治的心願，在輔仁大學內能實現幾多呢？這實在不容易下定論。無論是中國大陸或復校所在的台灣，這方面現存的紀錄及文獻都十分有限。（註二十八）我們所知的只是輔仁大學服膺國民政府對所有私立大學的行政規範，即表示有校務委員會統理校內一切事情，但我們卻看不出有任何嚴格的等級制度管制。學生自治僅限於校園生活及探索學問方面，似乎未能達到更高的校務管理及決策層面。（註二十九）在現存紀錄上，輔仁大學學生似乎較諸當時其他北京城內的大學，較少參與三十及四十年代的激進學生運動，但事實上他們在三十年代末期確曾投身大規模的反政府遊行，

四十年代末期也同樣曾經這樣做。

輔仁大學似乎比震旦大學在管理上民主得多。輔仁在一九三八年開始實行男女同校，（註三十）較其他中國的大學是晚了很多。校內的行政模式悉遵國民政府的規範，即由各系代表組成學術事務委員會，並設有教務處及訓育處。陳垣後來成為了輔仁大學校長，他的領導風格及人們對他的信任，使輔仁大學較震旦大學的形象開明得多。不過，平心而論，輔仁大學的行政範疇，仍與馬相伯原先期望的學制及以研究為主的構思有一段距離。

一九三三年美國經濟大蕭條，迫使本篤會放棄輔仁大學的管理工作，輔仁改由德國聖言會接辦。這一變動令輔仁大學可以在抗日戰爭期間，繼續在淪陷區北京維持校務，保持行政獨立、學術自由，並堅守拒絕承認日本政權的立場。抗戰期間，輔仁大學收錄了一群學術水準極高的學生，並吸納了因其他大學封校或流徙而離職的知名學者。陳垣不停地保障教員及學生的自由，在抗拒日本人的威脅之餘，又要捱受著來自困守一方的國民政府的壓力。很多時雖然歷盡艱苦，仍能拯救出因政治問題而被囚禁的人。輔仁大學在中國天主教大學史上，有很多具傑出的地方，本文無法一一論列。本文只是大略介紹兩位中國天主教的傑出教育家，英斂之及馬相伯先生。馬相伯所主張揉合政治、知識、教育、宗教思想的理想，對結合中國人的美德及天主教思想的優點，為我們提供了具體的模式。在他與英斂之的交往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是如何合作無間，去哺育這份共同的理想。

（附註見本刊頁58）